

《特稿》

文學批評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方法 ——兼談朱自清的文學批評研究

陳國球

摘 要

現今大學中文系的課程，往往設有「文學批評」一科，講授內容往往由先秦文學觀念開始，下及魏晉南北朝《文心雕龍》、《詩品》，宋元明清各種詩話文論等，成為一個自足的領域。然而，「文學批評」傳入現代中國，原意在於促進文學接受過程的知識化，由感受欣賞轉化成分析評鑑，從而為「文學」進佔大學教育的席位，提供支援；由於「文學批評」被認為「外來的」、「現代的」的文學概念，要在中國文學的範圍應用，有必要往傳統的類近文學表現形式作歷史考察，由是又有「文學批評史」的研究；然而「文學批評史」原來目的仍在了解古代文學如何被詮釋和理解，而不在「批評史」之割離於文學的接受而劃地自限。本文嘗試追溯「文學批評」進入現代中國的過程，揭示早期文學界對此的認知與命名立意的討論，以至建立「文學批評史」的需求，並以西方類同的學術發展作比照。再以朱自清的文學批評研究為例，說明「文學批評」之成為中國文學研究方法的現代學術思考。

關鍵字：文學批評、批評史、羅根澤、韋勒克、朱自清

* 陳國球現職為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暨中國文學講座教授。

Literary Criticism as Methodology of Literary Study ——Exemplifying with Zhu Ziqing’s Critical Works

K. K. Chan

Abstract

“Literary Criticism” is a prevalent subject of study in the literature curriculum of many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nowadays.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modern” and “western” concept into the discipline of Chinese study is meant to equip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literature with methodology and analytical skills. In the same vein,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aims to explore how literature is approached and understood in the past. Therefore, the study of literary criticism, together with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criticism, is not exclusive and autonomous, but conducive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proper.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way it enhances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university, exemplifying with the critical works of Zhu Ziqing .

Key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history of criticism, Lo Genze, René Wellek,
Zhu Ziqing

* Dean of Humanities and Chair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文學批評」是王夢鷗先生的學術工作其中一個重要領域。我們這一輩研習文學批評都曾受王先生的影響。我以為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臺灣學術史有一段「文學批評」的黃金時期，當中就見到王先生學術的餘韻流風。¹

現在香港和臺灣一般大學中文系的課程，往往設有「文學批評」一科，講授內容往往由先秦文學觀念開始，下及魏晉南北朝《文心雕龍》、《詩品》，宋元明清各種詩話文論等，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個自足的領域，學科邊界清晰，與中國文學各種體類如詩詞駢散文與小說戲曲等科目並立，彼此即有關連但可以各安其份，不相混同。然而，文學批評在中國文學學科建立的過程中，其意義遠超過作為中國文學之下的一個體類分項。文學批評的意義首先在於在支援文學從怡情悅性的活動變成對文學本質有所體認的分析方法或者學問，再而為文學進佔現代學制發揮一種錨定的效應。然而，當文學批評進入學科建制以後，又發生不同的變化；這個學術史上的現象，很值得我們反思。

一、「文學批評」的現代認知：

朱自清在 1946 年發表〈詩文評的發展〉，作為羅根澤與朱東潤剛出版的「文學批評史」的書評，同時也表達了他對「文學批評」的見解：

「文學批評」是一個譯名。我們稱為「詩文評」的，與文學批評可以相當，雖然未必完全一致。我們的詩文評有它自己的發展，現在通稱為「文學批評」，因為這個新名字清楚些，確切些，尤其鄭重些。……

也許因為我們正在開始一個新的批評時代，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要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就得認識傳統裏的種種價值，以及種種評價的標準；於是乎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有些就將興趣和精力放在文學批評史上。……文學批評史不止可以闡明過去，並且可以闡明現在，指引將來的路。

「文學批評」原是外來的意念；……靠了文學批評這把明鏡，照清楚詩文評的面目。詩文評裏有一部分與文學批評無干，得清算出去；這是將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是第一步。還得將中國還給中國，一時代還給一時代。按這方向走，才能將我們的材料跟

¹ 參閱陳國球 K. K. Chan：《抒情中國論》*Shuqing Zhongguo lun*（香港[Hong Kong]：三聯書店[Sanlian shudian]，2013 年），頁 140。

那外來的意念打成一片。²

這幾段引文的重點有二：

1. 現代中國要接受的知識分類方式，主要是「外來的」——「西方的」；因此「詩文評」雖是傳統本有的文體分類，卻有賴「文學批評」此一「外來的意念」來修正及鞏固，以「打成一片」。
2. 現代的中國文學研究有需要從價值的「重新估定」入手，因此，也有必要了解傳統的價值系統；研究過去的文學價值和標準——「文學批評史」，有助理解中國文學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於此朱自清既對「文學批評」作為中國現代學術科目的內容和範圍立說，也嘗試說明這種認知與中國文學研究的關係。

類似的想法更早見於蘇雪林在 1935 年發表的〈舊時的「詩文評」是否也算得文學批評？〉；她說：

那些史書藝文志的「文史類」和《四庫全書》的「詩文評類」所收的歷代詩話，詞話，曲話文話等書，雖然是汗牛充棟，但一問內容：則有的記敘見聞，啟抒胸臆，好像是隨筆小品；有的羅網軼聞，摭拾掌故，近似作家身邊瑣事；有的列舉形式，談論作法，有如修辭學；有的高標神悟，微示禪機，則又疑為玄談，還有那些分立門戶，出主入奴，借批評為黨同伐異的工具的，更品斯下矣。繩以西洋嚴格的文學批評法則，我們說中國沒有文學批評這回事，也不算是什麼苛論吧？

在提出這個否定的論點之後，她筆鋒一轉，說：

但我則說中國文學批評是有的，不過比西洋落後罷了。……假如我們想建設中國文學批評的系統，不能單靠那些現在的詩話詞話曲話文話，四六話，……我們研究的範圍應該推廣些，眼光應該放遠些。³

² 朱自清 Zhu Ziqing:〈詩文評的發展〉“Shiwenping de fazhan”，《讀書通訊》*Dushu tongxun*113 期（1946 年），頁 14-17。題下註明：「評羅根澤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隋唐文學批評史（以上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一、二、三分冊）：商務印書館出版 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開明書店出版。」

³ 蘇雪林 Su Xuelin:〈舊時的「詩文評」是否也算得文學批評？〉“Jiushi de ‘shiwenping’ shi fou ye suan de wenxue piping?”，鄭振鐸 Zheng Zhenduo、傅東華 Fu Donghua 編：《文學百

蘇雪林之說顯示出當時學術界對西方的「文學批評」有一個崇敬的期待，回觀中國文學傳統，則有事事不如人的自卑感。蘇雪林企圖迴護中國的批評傳統，只不過認為「文學批評史系統的建設則尚待我們將來的努力。」⁴

事實上，對傳統中國是否有「文學批評」的思考，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就開始出現。例如茅盾在 1922 年以「郎損」的筆名發表的〈文學批評管見一〉就說過：

中國一向沒有正式的什麼文學批評論；有的幾部古書如《詩品》、《文心雕龍》之類，其實不是文學批評論，祇是詩、賦、詞、讚……等等文體的主觀的定義罷了。所以我們現在講文學批評，無非是把西洋的學說搬過來，向民眾宣傳。但是專一從理論方面宣傳文學批評論，尚嫌蹈空，常識不備的中國群眾，未必要聽；還得從實際方面下手，多取近代作品來批評。⁵

就如向國人宣傳西方的、現代的學說一樣，並不容易，介紹「文學批評論」不能停留於「理論」層次，故必要從「批評」的「實踐」入手；真可謂苦心孤詣了。更早一年，《小說月報》從一本鴛鴦蝴蝶派的雜誌轉變為新文學刊物，同是茅盾撰寫的〈改革宣言〉，其中對西洋文學的「批評」一語有這樣的說明：

西洋文藝之興蓋與文學上之批評主義（Criticism）相輔而進；批評主義在文藝上有極大之威權，能左右一時代之文藝思想。新進文家初發表其創作，老批評家持批評主義以相繩，初無絲毫之容情，一言之毀譽，輿論翕然從之；如是，故能互相激厲而至於至善。我國素無所謂批評主義，月旦既無不易之標準，故好惡多成於一人之私見；「必先有批評家，然後有真文學家」，此亦為同人堅信之一端；同人不敏，將先介紹西洋之批評主義以為之導。然同人故皆極尊重自由的創造精神者也，雖力願提倡批評主義，而不願為主義之奴隸；並不願國人皆奉西洋之批評主義為天經地義，而改殺自由創造之精神。⁶

題》*Wenxue baiti*（上海[Shanghai]：生活書店[Shenghuo shudian]，1935年），頁282-287。

⁴ 同上註。

⁵ 郎損 Lang Sun（茅盾 Mao Dun）：〈文學批評管見一〉“Wenxue piping guanjian yi”，《小說月報》*Xiaoshuoyuebao* 13卷8期（1922年），頁2-3。

⁶ 茅盾 Mao Dun：〈改革宣言〉“Gaige xuanyan”，《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12卷1期（1921

茅盾在此把“Criticism”譯作「批評主義」，一方面可反映出新概念命名之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可見這個概念不僅指向一種文學體類或者文學活動，更是一種文學的主張（「主義」），認為這是西方文學的優勝之處，國人要師法學習。由此而言，被認定為源自西方的「文學批評」在當時具有先進和啟蒙的象徵意義，而其功能不止於評斷高下，更在於「新文學」的建設。

我們再簡要回顧「文學批評」在現代中國學術上的位置。早於 1904 年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已經引用叔本華之說而作「美術家」和「批評家」的二分，以為二者各有功能特性：

美術家先天中有美之預想，而批評家於後天中認識之。⁷

新文學運動前夕，胡適在 1916 年的留學日記中批評梅光迪：

觀莊治文學有一大病：則喜讀文學批評家之言，而未能多讀所批評之文學家原著是也。此如道聽途說，拾人牙慧，終無大成矣。⁸

胡適的意思當是讀「文學家原著」比較重要。1920 年郭紹虞在《晨報》連續發表〈藝術談〉系列文章，其中〈批評藝術與玩賞藝術〉一篇，對「吹毛求疵」的「批評家」有這樣的描述：

有一輩精通文藝的人，他對於文藝作品，取所謂批評家的態度，……他便不是為享受而賞玩，是為了批評，為了議論而考察了。這是為求知識上的滿足而忘了實際感情，這是很妨礙美感趣味的。⁹

從「文學批評」對「文學創作」的負面影響立論，在崇尚以創作表達思想自由的五四時期並不罕見，¹⁰郭紹虞之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對於「批評」這一活動中之「考察」、「議論」，以至「求知識」等傾向都有所察覺。

年)，頁 3。

⁷ 王國維 Wang Guowei：〈紅樓夢評論〉“Hongloumeng pinglun”，載謝維揚 Xie Weiyang、房鑫亮 Fang Xinliang 主編：《王國維全集》Wang Guowei quanji（杭州[Hangzhou]：浙江教育出版社[Zhejiang jiaoyu chubanshe]，2009 年）第 1 卷，頁 455。

⁸ 胡適 Hu Shi 著，曹伯言 Cao Boyan 整理：《胡適日記全編》Hu Shi riji quanbian（合肥[Hefei]：安徽教育出版社[Anhui jiaoyu chubanshe]，2001 年）第 2 冊，頁 428。

⁹ 郭紹虞 Guo Shaoyu：《藝術談》Yishu tan，載郭紹虞 Guo Shaoyu：《照隅室雜著》Zhaoyushi zazhe（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6 年），頁 34。

¹⁰ 例如冰心 Bing Xin 在 1921 年發表的〈論「文學批評」〉“Lun ‘wenxue pping’”，就有類似的見解，載《晨報副刊》Chenbao fukan 1922 年 1 月 22 日。至於為「文學批評」作出普遍

1921年1月，胡愈之在《東方雜誌》發表〈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更有系統地就「文學批評」的學科性質立論：

「文學批評」這一個名辭，在西洋已經有過幾千年的歷史了；可是在我們中國還是第一次說及。中國人本來缺少批評的精神，所以那種批評文學在我國竟完全沒有了。我國文學思想很少進步，多半許是這緣故。近年新文學運動一日盛似一日，文藝創作，也一日多似一日，但同時要是沒有批評文學來做嚮導，那便像船沒有了舵，恐怕進行很困難罷。所以我想現在研究新文學的人，對於文學批評，似乎應該有相當的注意。文學批評在西洋差不多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要把他的意義，歷史，派別詳細研究，自然不是幾千個字所能盡的。¹¹

胡愈之借助幾本當時流行的西方文學論著，如莫爾頓的《文學的近代研究》（1915年）、黑德生《文學研究導言》（1910年）、韓德《文學的原則和問題》（1906年），「權作在我國介紹文學批評的引子」。¹²他為「文學批評」下的定義是：

文學批評乃指討論文學趣味或藝術性質的批評而言。……錢玄同的〈儒林外史新序〉一部分可以算得文學批評，但是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卻只是歷史的批評，不是文學批評。又可見中國古來訓詁之學，也只是字句的批評（verbal criticism），不好算文學批評。¹³

又借韓德（Theodore W. Hunt，胡愈之文中先後譯成韓德及亨德）之言作界說：

意義的申辯的，也有如梁實秋〈文學批評辯〉等的主張，見《晨報副刊》*Chenbao fukan* 1926年10月27日、28日。這些論辯與中國文學研究發展關涉較淺，在此暫不討論。

¹¹ 愈之 Yu zhi 譯述：〈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Wenxue piping: qi yiyi ji fangfa”，載東方雜誌社 Dongfang Zazhishe 編：《文學批評與批評家》*Wenxue piping yu pipingjia*（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24年），頁 1-2。

¹² Richard Green Moulton,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5); William Henry Hud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10); Theodore W. Hunt, *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New York and London: Funk & Wagnalls Company 1906)

¹³ 愈之 Yu zhi 譯述：〈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Wenxue piping: qi yiyi ji fangfa”，頁 4。

文學批評乃是「用以考驗文學著作的性質和形式的學術。

（“Science and art which has to do wit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quality and form of literary authorship,” *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p.127）。¹⁴

胡愈之的論述首先為「文學批評」限定其「文學」的範圍，再確認這種討論屬於「科學／學術」的性質。他沒有繼續進一步比較中西文學批評。然而，他對「文學批評」的現代學術意義的申論，看來很有代表性。例如1924年北京《晨報》附刊《文學旬刊》有署名「和」的〈文學批評與編輯中國文學史〉，當中提到：

我們的中國，從古到今，嚴格的說來，未曾出現一冊文學的批評書。歷代的詩話之類，雖近於文學評論，然而離文藝評論的真價值，還遠的很呢，至多不過說她是文藝的極零碎的雜感罷了。¹⁵

大約同時，嶺南大學出版的《南風》又載有陳榮捷〈中國文學批評〉一文，認為：

中土之文學評論，實不得謂為有統系的研究，成專門的學問，產生專門的人才。以言研究，則批論〔評論？〕的原理方法與名詞均未成立。以言學問，則讀文學史者，對於某作家之受傳統的印象，並無實証式科學的解釋之可言。以言人才的除劉勰章學誠金聖嘆等外，竟不多覩。書籍只得《文心雕龍》，《文史通義》，《藝苑珠叢》諸書，然非井然有序者也。¹⁶

朱光潛留學愛丁堡大學時，曾投稿《東方雜誌》，發表〈中國文學之未開闢的領土〉（1926年）一文，討論中國文學研究應開墾的領域，其中就包括「文學批評」的部分：

¹⁴ 愈之 Yu zhi 譯述：〈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Wenxue piping: qi yiyi ji fangfa”，頁5。

¹⁵ 愈之 Yu zhi 譯述：〈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Wenxue piping: qi yiyi ji fangfa”，《文學旬刊》*Wenxue xunkan* 54期（1924年10月），頁1-2。文中又有提到「文藝的評論」和「科學的文藝評論之別」，前者「扶助青年作家的上進」，「指示讀者欣賞文學的高妙的地方」，後者「可以使我〔們〕了解一切的文學所以為文學的道理」。

¹⁶ 陳榮捷 Chen Rongjie：〈中國文學批評〉“Zhongguo wenxue piping”，《南風》*Nanfeng* 1卷3期（1924年11月），頁33。

文學應獨立，而獨立之後，應分門別類，作有系統的研究，……尤其重要的是把批評看作一種專門學問。中國學者本亦甚重批評，劉彥和的《文心雕龍》，劉知幾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在批評學方面，都是體大思精的傑作，不過大部分批評學說，七零八亂的散見群籍。我們第一步工作應該是把諸家批評學說從書牘笱記，詩話及其他著作中摘出——如《論語》中孔子論《詩》，《荀子·賦篇》，《禮記·樂記》，子夏〈詩序〉之類——搜集起來成一種批評論文叢著。於是再研究各時代各作者對於文學見解之重要傾向如何，其影響創作如何，成一種中國文學批評史。¹⁷

朱光潛說「中國學者本亦甚重批評」，與前面諸家講法不同，但重點不在此而在於大家都認同中國過去的「學說」的「七零八亂」，有待整理，必須由搜集資料開始，再而撰寫「文學批評史」。

就在這種思潮背景下，出現了第一本《中國文學批評史》（1927年），由曾在大學講授文學批評課的陳鍾凡編寫。¹⁸繼之而起的，是從1927年開始在燕京大學（1927-1948年）講授「文學批評」的郭紹虞，以及接替郭紹虞在清華

¹⁷ 朱光潛 Zhu Guangqian:〈中國文學之未關的領土〉“Zhongguo wenxue zhi weipi de lingtu”，《東方雜誌》*Dongfang zazhi* 23卷11期（1926年），頁88。

¹⁸ 這中國第一本文學批評史的撰著，應與陳鍾凡在上世紀20年代於幾所學校開設的「文學批評」課有關。他從1921年8月到1924年11月在東南大學任國文系主任兼教授，1924年12月到1925年底在廣東大學任文科學長兼教授，1926年2月應聘到金陵大學任國學教授兼系主任。彭玉平曾引述《廣東大學周刊》1925年10月陳鍾凡的報告說《中國文學批評史》年內可成書，故認為此書撰寫的關鍵時期亦在廣東大學任內；又李春青等引述周勛初之說，以為此書與陳鍾凡在東南大學的教學工作有關；陳正宏則認為是陳鍾凡在金陵大學任內撰寫；分見〈陳鍾凡與批評史學科之創立〉“Chen Zhongfan yu pipingshi xueke zhi chuangli”，載彭玉平 Peng Yuping:《詩文評的體性》*Shiwen ping de tixing*（北京[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12年），頁63；李春青 Li Chunqing等:《20世紀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史》*20 shiji Zhongguo gudai wenlun yanjiushi*（濟南[Jinan]: 山東教育出版社[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2008年），頁271；陳正宏 Chen Zhenghong、章培恒 Zhang Peiheng主編:《中國學術名著提要·文學卷》*Zhongguo xueshu mingzhu tiyao: wenxue juan*（上海[Shanghai]: 復旦大學出版社[Fudan daxue chubanshe]，1999年），頁772。此外，陳鍾凡 Chen Zhongfan在1937年發表的〈二十年來我國之國故整理〉“Ershi nian lai woguo zhi guogu zhengli”文中提到自己「昔著《中國文學評論》，以《文學批評史》弁其簡端：中華書局因印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及《中國韻文通論》兩部。」見《學藝》*Xue yi* 16卷第1期（1937年），頁7。

大學講同一門課（1932-1934年）的羅根澤、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1932-1938年）的方孝岳，三人同在1934年有「批評史」的著作面世。¹⁹此外，朱東潤在1929年應聘武漢大學，開始任教「中國文學批評」課，也開始編寫「批評史講義」，但出版則遲至1944年。²⁰至今這幾位先生被視為現代「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奠基者。

二、中國的「批評」與西方的“criticism”

由茅盾、胡愈之，到朱光潛、朱自清，都認為西方的「文學批評」有悠久的歷史，而中國古代的文學批評零碎不成系統，所以要向西方學習。事實上自近代以來，由軍事、政治，到社會文化，中國幾乎是全方位的受到西潮衝擊，知識體系亦因「現代化」之名要作出秩序的重組，西方的知識分類成為「現代」的標誌。當西方的「文學批評」觀念傳入以後，國人就向傳統尋索，企圖從古典分類中整理爬梳，找出符合新標準的部分以為相應。蘇雪林〈舊時的「詩文評」是否也算得文學批評？〉一文從題目到篇旨，都是這個過程的明確標誌。朱光潛在1926年預示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就是承此而來的發展；其中羅根澤從1934年完成《中國文學批評史》第1冊，到10年後的1944年發表〈怎樣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重寫本《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新「緒言」；²¹這篇論文是他的研究經驗的階段性總結，也可以說是當時企圖貫通中西傳統的比較成熟的思考。

¹⁹ 郭紹虞 Guo Shaoyu：《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Zhongguo wenxue pipingshi (shang juan)*（上海[Shanghai]：商務印書館[Shangwuyinshuguan]，1934年）；羅根澤 Luo Genze：《中國文學批評史（一）》*Zhongguo wenxue pipingshi (1)*（北平[Beiping]：人文書店[Renwen shudian]，1934年）；方孝岳 Fang Xiaoyue：《中國文學批評》*Zhongguo wenxue piping*（上海[Shanghai]：世界書局[Shijie shuju]，1934年）。

²⁰ 朱東潤 Zhu Dongrun：《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Zhongguo wenxue pipingshi dagang*（重慶[Chongqing]：開明書店[Kaiming shudian]，1944年）。

²¹ 羅根澤 Luo Genze：〈怎樣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Zenyang yanjiu Zhongguo wenxue pipingshi”，《說文月刊》*Shuowen yuekan* 合刊本4卷（1944年），頁777-795。張健先生曾比對羅根澤1934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第1冊與後來1943到1945年改寫的周秦至晚唐各冊文學批評史，指出羅根澤的文學觀念與文學批評史編纂觀念的前後變化；又指出相對於編纂觀念的改易，兩本批評史的具體內容變化卻不大，認為羅根澤的批評史「存在着史觀與著述體例不一致的問題」；見張健：〈從分化的發展到綜合的體例：重讀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Cong fenhua de fazhan dao zonghe de tili: chongdu Luo Genze *Zhongguo wenxue pipingshi*”，《文學遺產》*Wenxue yichan* 2013年1期，頁127-146。

羅根澤這篇長文的其中一個主要論旨，就是以他所理解的西方文學批評為出發點，思考在中國文學傳統中，文學批評的存在模式和特性。他先指出近人談文學批評「大半依據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學批評史的說法」，劃分為「主觀的、客觀的、歸納的、演繹的、科學的、判斷的、歷史的、考證的、比較的、道德的、印象的、賞鑑的、審美的十三種」，²²他認為是「不夠的」，於是從設想中的文學批評的步驟和相關的活動以至準則，如：「批評的前提」、「批評的進行」、「批評的立場」、「批評的方法」、「批評的批評」、「批評的設建」等，作出更細緻的釐分，得出更多的項目，看來已跡近繁瑣；幸好他在推衍分項之餘，又有綜括歸納：

按文學批評是英文 Literary Criticism 的譯語。Criticism 的原來意思是裁判，後來才演繹為文學裁判，又由文學裁判引申到文學裁判的理論及文學的理論。文學裁判的理論就是批評原理，或者說是批評理論。所以狹義的文學批評，就是文學裁判；廣義的文學

²² 複檢森次巴力的《文學批評史》，卻未見有羅根澤所舉列的十三種批評；森次巴力另有《英國文學論文集》一書，其中〈導論〉副題為「文學批評的種類」，只提到「科學批評」和「比較批評」；但文中詳細闡述他個人的批評理念，頗值得參考。見 George Saintsbury, *History of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aste in Europe from the Earliest Texts to the Present Day*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 Sons Ltd, 1900-1904); “Introductory Essay,” in George Saintsbury, *Essay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780-1860* (London: Percival and Co., 1890) pp.ix-xxix。此外，陳鍾凡《中國文學批評史》第2章討論「批評之派別」，提到十二類批評：歸納的、推理的、判斷的、考訂的、歷史的、比較的、解釋的、道德的、審美的、印象的、欣賞的、科學的；與羅根澤所列亦有參差。陳鍾凡於本章參考書列出三本當時相當流行的文學理論參考書：C.T. Winchester, *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11); Richard Green Moulton,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16); W.H. Hud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10)；複查三書亦不見有這十二或十三類別的羅列。此外，胡愈之在〈文學批評——其意義及方法〉也先後舉列不同種類的批評，包括：五種意義：指摘、讚揚、判斷、比較、分類；四種方式：歸納的、推理的、判斷的、自由或主觀的；再加上科學的、倫理的、鑑賞的、審美的、印象的等不同類別的批評，見《文學批評與批評家》*Wenxuepingyuyupingjia*，頁2-12；後來鄭振鐸、傅東華編《文學百題》*Wenxuebaiti*（上海[Shanghai]：生活書店[Shenghuoshudian]，1935），當中又分別討論以下這些不同種類的批評：觀念論的、演繹的、歸納的、科學的、歷史的、印象的、鑒賞的、審美的、人文主義的等等。大概當時文學界多從不同渠道的翻譯汲引知識，然後又輾轉抄錄添補，以致成就了許多「創造性」的書證。

批評，則文學裁判以外，還有批評理論及文學理論。²³

他提出的文學裁判、批評理論、文學理論的三分法，是相當有見地的。對文學研究的相關概念比較深思熟慮的理論家韋勒克 (René Wellek)，在〈文學理論、批評與歷史〉(1960年)一文中，也討論到「文學批評」從廣義可包括「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即文學的通則與系統知識，以及專指具體作品的詮釋和評價的「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他贊成二者應該清楚劃分，但他自己從1955年陸續刊行的多卷本《現代文學批評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卻又「從眾」以「批評」賅括「文學理論」。²⁴今天看來，當時韋勒克正身處英美學界的「批評的時代」(age of criticism)，²⁵「吾從眾」的想法是有其道理的。羅根澤在「文學裁判」和「文學理論」之外，更顧及「批評的理論」的環節，在他的框架而言是合理的。他進一步以此區別西方和中國的批評傳統的特質：

西洋的文學批評偏於文學裁判及批評理論，中國的文學批評偏於文學理論。所以他們以原訓「文學裁〔判〕」的 Criticism 統括批評理論，我們的文學批評，則依鄙見，應名為「文學評論」……中國的批評，大都是作家的反串，並沒有多少批評專家。作家的反串，當然要側重理論的建設，不側重文學的裁判。²⁶

他認為西洋與中國之別在於前者重裁判，後者重在領導創作；為了證明他的說法，他就從命名立意的方向追溯源頭，分別查考「批」、「評」、「論」三字的字源意義，據《說文解字》指「批」原意是「反手擊」，至唐代引申為「批示批答」，宋代以後科舉場屋有批注評釋、眉批總評；據他的理解：

中文的「批評」一詞，既不概括，又不雅馴，所以應名「評論」。……眉批總評的批評，源於場屋。這種批評就是抉剔，當然只是文學

²³ 羅根澤 Luo Genze:〈怎樣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Zenyang yanjiu Zhongguo wenxue pipingshi”，《說文月刊》*Shuowen yuekan* 合刊本4卷（1944年），頁778。

²⁴ René Wellek, “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 and History,” *Sewanee Review* 68 (1960): 1-19; also in René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1-20.

²⁵ 「批評的時代」說可參考 Murray Krieger, “Institutionalizing Theory: From Literary Criticism to Literary Theory to Critical Theory,” in Murray Krieger, *The Institution of Theor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23. 下文第二、三節對此續有討論。

²⁶ 羅根澤 Luo Genze:〈怎樣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Zenyang yanjiu Zhongguo wenxue pipingshi”，頁783-784。

裁判。不能兼括批評理論及文學理論，所以不概括；其來源是科舉場屋，所以不雅馴。……

以「評」名書或文者已經不多，以「批評」名書或文者，更絕對沒有；有之如無聊選家——特別是制藝家的眉批總評，又無甚價值，沒有特別提敘的必要。²⁷

至於「論」，他又引《說文》說「議也」，王充以《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辨其實虛」；「評」字《說文》作「平」，漢以後有汝南月旦評的「人物的裁判」的意思；至鍾嶸《詩品》則又名為「詩評」，應用到「文學的裁判」（我們應注意他又說以「評」名書或文者不多）；「評論」連為一詞，早期也是指「人物評論」。接着他舉出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及《顏氏家訓·文章篇》之例，然而後說「後來說到文學評論的更多，不一一列舉」。²⁸他的結論是：中國的“criticism”應「正名」為「文學評論」，「批評」一詞可以留給西方。

我們今天檢視羅根澤在上世紀 40 年代對「文學批評」概念的論述，當然會看到其不足之處。首先他對中西方批評傳統的差異看成「偏於文學理論」和「偏於文學裁判」之別，並不準確。比方說，西方講求理論通則的「詩學」（poetics）傳統源遠流長，說不上只偏重裁判；²⁹有關中國不重裁判而重理論的看法，朱自清在〈詩文評的發展〉一文中也提出商榷。³⁰又例如「批」、「評」、「論」等字源的追溯，其實意義不大；因為這些字詞運用，已經歷多重引申轉借，其衍變之跡不易釐清，看不出其古義對今義的影響。再者我們必須注意這些字詞的語用實況：是否指向「門類」的集合概念？有沒有進入公眾知識的領域？因為語用往往由上下文語境來支撐，如果只具特殊性而無普遍意義，則不能說明這些詞彙有作為門類的統攝能力、並為集體意識所認可。因此，若要從中國文學傳統中考掘“criticism”，最便捷還是從目錄分類入手，故此，自新文化運動以還，目錄學上的「文史」、「詩文評」就常常被提舉以為比較；近年如吳承學、曾守正、彭玉平等就此有非常細緻的考析。³¹據此，我們知道「文史」

²⁷ 羅根澤 Luo Genze：〈怎樣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Zenyang yanjiu Zhongguo wenxue pipingshi”，頁 780、784。

²⁸ 同上註，頁 780-781。

²⁹ Lubomír Doležel, *Occidental Poetics: Tradition and Progres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³⁰ 朱自清 Zhu Ziqing：〈詩文評的發展〉“Shiwenping de fazhan”，頁 14-15。

³¹ 參考吳承學 Wu Chengxue：〈論《四庫全書總目》在詩文評研究史上的貢獻〉“Lun Siku quanshu zongmu zai shiwenping yanjiushi de gongxian”，《文學評論》Wenxue pinglun 1998 年

首見於唐開元、天寶間，《崇文目開元四庫書目》、《西齋書目》有之，而宋代目錄多有延續，收錄包括《史通》等史評著作，以及《文心雕龍》、《詩品》，與詩話、詩格等；「詩文評」之目見於明代如焦竑《國史經籍志》、祁承火業《澹生堂藏書目》等，到清代因《四庫全書》確立此目而構成清晰的文體界線。然而，作為集部的附庸類別，卻未能直接與 19、20 世紀的現代學術和知識秩序中的“criticism”概念相銜接。反之，「批評」一詞卻被接枝繁殖，成為這個重要的現代文學概念的中文名稱。據朱自清的理解，「這個新名字清楚些，確切些，尤其鄭重些」，他明顯不同意羅根澤所講的「不雅馴」。³²

事實上，「批評」兩字當然不新。宋代開始有所謂「批」、「抹」、「評」、「點」，其源起可能與理學家研讀經書的習慣有關，而不是如羅根澤所說的「源於場屋」；不少人視之為俗陋之學（羅氏所謂「不雅馴」），是囿於《四庫提要》的成見，加上五四以還反封建八股的思潮所致。³³作為傳統閱讀文本的活動的「批抹評點」，比較通用的省稱是「批點」或者「評點」；「批」與「評」連成一詞，而又與文學相關聯的用法不會太早。元代錢謙序《大雅集》云：

天臺賴先生善卿以三十年之勞，不憚駕風濤，犯雨雪，冒炎暑，以采江南北詩人之詩，……會稽楊鐵崖先生批評而序之，命篇曰《大雅集》。³⁴

按《大雅集》為元代賴良編採，楊維禎為之評定，《四庫提要》說：「茲集乃良所哀輯，而維禎所刪定，故每卷前署『維禎評』字也。」可知在元代「評點」與「批評」是可以互換的字眼。在明代這種情況更為普遍，例如劉辰翁的評點，明代有刻本題作《劉須溪批評九種》；楊慎《升菴集》就說：

6 期，頁 130-139；曾守正 Ceng Shouzheng：《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Quanli, zhishi yu pipingshi tuxiang. Siku quanshu zongmu 'shiwen pinglei' de wenxue sixiang*（臺北[Taipei]：學生書局[Xuesheng shuju]，2008 年）；彭玉平 Peng Yuping：《詩文評的體性》*Shiwen ping de tixing*。

³² 朱自清 Zhu Ziqing：〈詩文評的發展〉“Shiwening de fazhan”，頁 14。

³³ 有關評點學的興起，以及《四庫全書》與評點學的關係，可參看吳承學 Wu Chengxue：〈評點之興——文學評點的形成和南宋的詩文評點〉“Pingdian zhi xing: wenxue pingdian de xingcheng han Nan Song de shiweningdian”，《文學評論》*Wenxue pinglun*1995 年 1 期，頁 24-33；吳承學 Wu Chengxue：〈《四庫全書》與評點之學〉“Siku quanshu yu pingdian zhi xue”，《文學評論》*Wenxue pinglun*2007 年 1 期，頁 5-12。

³⁴ 〔元〕Yuan 錢謙 Qian Nai：〈大雅集原序〉“Dayaji yuanxu”，收於〔元〕Yuan 賴良 Lai Liang 輯：《大雅集》*Dayaji*（《四庫全書》本），頁 2 上。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於唐人諸詩及宋蘇黃而下俱有批評。³⁵

又徐渭評點《西廂》，有刻本題作《徐文長先生批評北西廂記》（明崇禎4年刻本），也是這個意思。李夢陽給楊一清的書信有提到對楊氏之作嚴加「批評」：

大製三冊勘校各畢，中間批評言語放肆，去取嚴刻，殊非事長事貴之禮。愚以為託屬既專，導誘復至，使有懷弗罄，不涉於欺乎？故寧言之而欠當，不忍知之而弗言。³⁶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敘》云：

予於是手掇韓公愈、柳公宗元、歐陽公修、蘇公洵軾轍、曾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為批評之，以為操觚者之券。³⁷

從李夢陽、茅坤之言，我們見到「批評」是對文本的評審判斷，正是羅根澤定義“criticism”的「裁判」的意思；後來《四庫提要》鄙夷明代庸眾的文化商業活動，對此大加貶抑；然而，清代也有如方東樹為此作出辯護，他在〈書歸震川史記圈點評例後〉云：

古人著書為文，精神識議固於語言文字，而其所以成文義用或在於語言文字之外，則有識精者為之圈點抹識批評，此所謂筌蹄也；能解於意表而得古人已亾不傳之心，所以可貴也。近世有膚學顛固僻士，自詡名流，矜其大雅，謂圈點抹識批評沿於時文儻氣，醜而非之。……夫圈點評抹古人所無，宋明以來始有之；去之以為大雅，明以前所無，國朝諸公始為此論。吾以為宇宙亦日新之物也；後起之義，為古人所無而必不可蔑棄者亦多矣。苟卿所以法後王也。後人識卑學淺，不能追古人，而又去其階梯，是絕之也。³⁸

³⁵〔明〕Ming 楊慎 Yang Shen：《升菴集》Shengan ji（《四庫全書》本）卷49，頁16上。楊慎又在〈檀弓叢訓序〉提到自己在編撰《檀弓叢訓》時收入陳騷、謝枋得的評語說：「陳騷、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見《升菴集》卷2，頁13下。

³⁶〔明〕Ming 李夢陽 Li Meng yang：《空同集》Kongtong ji（《四庫全書》本）卷63，頁10下-11上。

³⁷〔明〕Ming 茅坤 Mao Kun：《茅鹿門文集》Mao Lumen wenji（明萬曆刻本）卷14，頁5上下。

³⁸〔清〕Qing 方東樹 Fang Dongshu：《攷槃集文錄》Kaopan ji wenlu（清光緒20年本），卷5，頁40上-42下。

由以上的引文看來，「批評」一詞自明代以來，已是一個習見的概念，又如明末朱舜水的文集，從卷 24 到 25，就立有「批評」一體，其形式已不在局限於在選本中作眉批總評，而自成體類。³⁹至於其文體功能，既有所謂「去取」的審裁，也有「解於意表而得古人之心」的詮釋作用，更可作「操觚者之券」而為文學創作的理論指南；這些涵義，大概也能符合羅根澤從西方的“criticism”所演繹出來的廣義和狹義。相對於「批點」和「評點」，「點」字指向圈點等今天基本上已廢棄的閱讀符號，「批評」二字連用看來比較妥貼，比較容易植入現代的觀念而重新發展。

近代學者屢屢說西方「文學批評」有悠久的歷史，事實上，如果從命名立意的角度看，西方的“criticism”的歷程也不見得多麼清晰。韋勒克(René Wellek)就先後撰寫幾篇文章討論“criticism”的淵源與發展：先是 1962 年提交第 3 屆比較文學國際學會會議的〈文學批評的術語與概念〉，再而是 1968 年為《意念史辭典》撰寫的專題文章〈文學批評〉，以及據此擴充修訂、收入 1981 年出版的論文集《批評是甚麼？》的同題論文。⁴⁰根據韋勒克的研究，英文的“criticism”一詞，要晚到 17 世紀初才出現，先見於詩人德萊頓(Dryden)的筆下，其確立可以波普(Alexander Pope)在 1711 年發表的《批評論》(*Essay in Criticism*)為證。這樣看來“criticism”比中文的「批評」一詞之成形更晚。韋勒克也有為此詞溯源，指出其源起是希臘語的 *krinō*，裁判，以及 *krités*，裁判員。文學的裁判 *kritikós* 則出現於公元前 4 世紀，主要與文法家(grammarians)區別，古典拉丁文作 *criticus*，但罕見使用；此詞主要指文本與文字的詮釋，而非文學高下的裁判。到中世紀則轉成醫學用語，指病情危殆。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此詞再度冒現，但其意義主要限於文本的校讎考訂。一直到意大利學者史加里格(Julius Caesar Scaliger)手中，*criticus* 一詞才有其文學價值高下裁判的意義。

³⁹ [明]Ming 朱之瑜 Zhu Zhiyu:《舜水先生文集》*Shunshui xiansheng wenji* (日本正德 2 年刻本)，卷 24-25。朱舜水在「批評」一體中，討論的不限於文學，例如〈批評一〉之下，就是〈批毛詩〉、〈批尚書〉、〈批禮記〉等等。

⁴⁰ René Wellek, “The Term and Concept of Literary Criticism,”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Hague: Mouton and Co., 1962), pp.1-15; also in René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21-36; René Wellek, “Literary Criticism,” in Philip P. Wiener, ed.,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8), Vol. 1, 596-607; René Wellek, “Literary Criticism,” in Paul Hernadi, ed., *What is Critic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297-321.

此後，批評的觀念開始在歐洲不同地區擴展，而“criticism”一詞在 17、18 世紀分別流入各國，而在意涵上有其遽遞變化。比方說，在德國的“kritik”或“kritisch”的應用範圍漸漸縮窄到「每日書評」一類輕盈的文學點評，有關文學的嚴肅討論空間由「美學」(ästhetik)及「文學科學」(literaturwissenschaft)佔據；這種情況直到寇提斯(E. R. Curtius)的重要著作《歐洲文學與拉丁中世紀》(*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在 1948 年面世，才有所改變。至於二十世紀英語世界中，經由瑞恰慈(I. A. Richards)的《文學批評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24 年)，到藍遜(J. C. Ransom)的《新批評》(*The New Criticism*, 1941 年)、佛萊(Northrop Frye)的《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 年)等等著作的出現，「批評」的學術意義就穩固下來。

從韋勒克的討論可以見到，西方的文學批評傳統的建立，也要通過一個「追認」的過程，「批評史」就必須面對這種沿波討源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批評史」的出沒又與學術思潮之更替有關。我們知道西方的文學批評史始見於 19 世紀中葉，由泰理(Augustin-François Théry)的《古今文學論見發展史》(*Histoire des opinions littéraires chez les anciens et chez les modernes*, 1844 年)啟航；⁴¹再有蓋利與史葛(C. Y. Gayley and F. N. Scott)合編，兼顧史料與歷史概覽的《文學批評的方法與資料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899 年)；⁴²然後出現了森次巴力的《文學批評史》(1900 年)；這是文學史、語文學、與文學觀念史初度結合的時期。⁴³借用克里格(Murray Krieger)的觀點來看，森次巴力這本批評史大抵可以代表英美學界的「批評的時代」前的預備階段，批評家與學者開始為「文學批評」尋找學術上位置，「批評傳統」的面貌開始建立。再到 20 世紀 50 年代，以抗拒「歷史主義」為號召的「新批評」大師，衛姆賽特與布魯克斯(William K. Wimsatt, Jr. and Cleanth Brooks)，竟然會合力撰寫一本並不簡短的《文學批評簡史》(*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 1957 年)；這七百多頁的批評史敘事體，標誌了文本中心的批

⁴¹ Augustin-François Théry, *Histoire des opinions littéraires chez les anciens et chez les modernes* (Paris: Dezobry, E. Magdeleine et Co., 1844) .

⁴² C. Y. Gayley and F. N. Scot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 (Boston: Ginn & Co., 1899) .

⁴³ 參考 George Kenned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Volume I: Classical Critic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Preface,” pp.ix-xv.

評思潮全面佔領學院講壇，與韋勒克的《現代批評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8 volumes, 1955-1992 年) 合為「批評的時代」的里程碑。他們的書寫行動，目的是證明今日的業績足以載入史冊而無愧色。⁴⁴但與此同時，「文學理論」已借批評系統化之勢漸漸興起；到上世紀 80 年代有學者驚覺「批評的危機」，其實這時刻早已進入「理論的時代」了。⁴⁵後來甘迺迪 (George Kennedy) 等一眾學者費時二十多年編成的九大卷《劍橋文學批評史》(*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89-2013 年)，以及哈別璧 (M. A. R. Habib) 以個人之力寫成八百多頁的《文學批評與理論史》(*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2005 年)，確證「批評」必須換上新的面目才能參與由「理論」開發的文學研究活動，而「理論」與「後理論」之間，更是邊界模糊，形成眾聲喧嘩之勢了。⁴⁶

縱觀這些西方文學批評史的書寫，就可以見到「批評」傳統の後設建構工程。書寫者基本上是「以今視昔」，其尋索過程在處理「古典時期」的「批評史」時特別明顯；例如衛姆賽特與布魯克斯、甘迺迪等都要費力解說其間的討論範圍。我們再參看一些更為專門的論著如 Y. L. 杜 (Yun Lee Too) 《古典文學批評的意念》(*The Idea of Ancient Literary Criticism*, 1998)、福特 (Andrew

⁴⁴ William K. Wimsatt, Jr. and Cleanth Brooks, *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7);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8 volum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1992). 衛姆賽特與布魯克斯在《文學批評簡史》的〈導論〉中特別強調其討論的終極對象是「詩與文學」(poetry and literature)，即「語言藝術」(verbal art)；再者，作者選擇以「論辯式」展現批評史中的對峙論見(“An Argumentative History of Literary Argument in the West”)，這也是「新批評」專注「反諷」(irony)、「弔詭」(paradox)等讀詩方法應用於「文學意念史」之上。見 William K. Wimsatt, Jr. and Cleanth Brooks, *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7), pp.vii-xv。實際上，《文學批評簡史》可說是「新批評」學派意圖將其信念帶進永恆歷史的一種表現。又：克里格在《文學批評簡史》面世後不久發表長文批評衛姆賽特與布魯克斯的歷史主義傾向；見 Murray Krieger, “Critical Dogma and the New Critical Historians,” *The Sewanee Review* 66.1 (1958): 161-177.

⁴⁵ William E. Cain, *The Crisis in Criticism: Theory, Literature, and Reform in English Studie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aul Hernadi, ed., *What is Critic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Murray Krieger, *Words about Words about Words: Theory, Criticism, and the Literary Tex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⁴⁶ George Kennedy, et al,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2013) ; M. A. R. Habib, *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哈別璧另外還撰寫了一本《現代文學批評及理論史》: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A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Ford)《批評的起源：古希臘文學文化與詩論》(*The Origins of Criticism: Literary Culture and Poetic Theory in Classical Greece*, 2002年)、亨特(Richard Hunter)《古典文學的批評時刻：古人眼中的文學及其用途之研究》(*Critical Moments on Classical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Ancient View of Literature and Its Uses*, 2009年)等，就會見到學者們用力所在，正是解說當時的文化表現中有哪些是或者不是「文學批評」活動；⁴⁷其情況其實相當於本文開首引述朱自清〈詩文評的發展〉所描述的景況。如果稍稍改寫朱自清的原文，我們可以代擬一段尋索西方文學批評傳統的說明：

「文學批評」原是〔現代〕的意念；……靠了文學批評這把明鏡，照清楚〔部分前現代文化活動〕的面目。〔前現代文化活動〕裏有一部分與文學批評無干，得清算出去；這是將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是第一步。還得將〔前現代還給前現代〕。按這方向走，才能將〔前現代〕的材料跟〔現代〕的意念打成一片。⁴⁸

三、朱自清之「文學批評」研究的意義

上文以朱自清的話作為引子，以下我們會比較集中討論他的「文學批評」研究的道路，因為作為一個學術史的個案，朱自清的中國文學研究很能說明當時中國文學研究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和試圖解決問題的努力。⁴⁹

朱自清，原名自華，字佩弦，號秋實，1898年生。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畢業，任教於杭州、上海、臺州、寧波、上虞等地中學及師範學校，結交俞平伯、葉聖陶、夏丏尊、豐子愷、朱光潛等。1919年尚在大學階段，開始發表新詩，1921年加入文學研究社，1923年發表被譽為新文學中的《離騷》的長詩〈毀滅〉，1924年出版詩與散文集《蹤跡》。1925年得胡適及俞平伯介

⁴⁷ Yun Lee Too, *The Idea of Ancient Literary Critic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Andrew Ford, *The Origins of Criticism: Literary Culture and Poetic Theory in Classical Gree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Richard Hunter, *Critical Moments on Classical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Ancient View of Literature and Its U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⁴⁸ 方括號〔 〕內的文字為筆者所改換。

⁴⁹ 張健 Zhang Jian:〈借鏡西方與本來面目——朱自清的中國文學批評研究〉“Jiejing xifang yu benlai mianmu: Zhu Ziqing de Zhongguo wenxue piping yanjiu”一文，載《北京大學學報》*Beijing daxue xuebao* 48卷1期(2011年1月)，頁61-70，對朱自清的文學批評方向與當時的學術背景的關係有細緻深入的分析，與本文重點不同，請並參。

紹，轉到清華學校大學部任教「大一國文」和「李杜詩」。這時 28 歲的朱自清已是名滿天下的新文學作家，但在承接「國學研究院」傳統的中文部當中，他只是後學晚輩。他的同事就包括前清舉人汪鸞翔、曾為廩貢生的吳在、專治文字訓詁之學的楊樹達，以至從國學研究院來兼課的王國維等。⁵⁰事實上，當時的學術風氣就是以經籍訓詁和考據為重；例如北京大學由章太炎弟子如沈尹默、錢玄同、沈兼士、朱希祖等進佔以後，清代乾嘉之學的遺風成為主導；即使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後來加入北大，其實並沒有改變這種學風；因為胡適的學術品味，與章門弟子非常接近。⁵¹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說：

績谿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⁵²

胡適在〈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一文，就推許乾嘉考據學家的「科學精神」，認為清代的校勘學是一種「科學」。⁵³他提倡以這種精神和方法去「整理國故」，而他的文學研究，尤其是小說研究，也以考證、校勘為主幹。從 20 年代開始，由於胡適等人的影響力，文學研究的「考據學化」風氣瀰漫全國，各大學中文系愈加尊尚校讎考證及文字訓詁等大致可歸類為「語文學」(philology)的「科學」、「專業」的知識。⁵⁴

⁵⁰ 參考齊家瑩 Qi Jiaying:《清華人文學科年譜》*Qinghua renwen xueke nianpu* (北京[Beijing]: 清華大學出版社[Qinghua daxue chubanshe], 1999 年), 頁 16-61。

⁵¹ 錢穆 Qian Mu:〈學術傳統與時代潮流〉“Xueshu chuantong yu shidai chaoliu”一文指出:「民初新文化運動,實亦一套《國故論衡》,將舊傳統逐一加以新觀念、新批評,如是而已。」見《錢賓四全集》*Qian Binsi quanji* 第 23 冊(臺北[Taipei]:聯經出版公司[Lianjing chubangongsi], 1998 年), 頁 49。參考桑兵 Sang Bing:《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Wan Qing Minguo de guoxue yanjiu* (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jichubanshe], 2001 年), 頁 33-49。

⁵² 梁啟超 Liang Qichao:《清代學術概論》*Qingdai xueshu gailun* (上海[Shanghai]:商務印書館[Shangwuyinshuguan], 1921 年), 頁 8。

⁵³ 胡適 Hu Shi:〈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Qingdai hanxuejia de kexue fangfa”(1918 年),原刊《北京大學月刊》*Beijing daxue yuekan*,後改題〈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Qingdai xuezhe de zhixue fangfa”,收入他的《問題與主義》*Wenti yu zhuyi* (臺北[Taipei]:遠流出版公司[Yuanliu chubangongsi], 1994 年), 頁 163、182。

⁵⁴ 參考陳平原 Chen Pingyuan:〈作為新範式的文學史研究〉“Zuowei xinfanshi de wenxueshi yanjiu”,《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Zhongguo xiandai xueshuzhi jianli: yi Zhang Taiyan, Hu Shizhi wei zhongxin* (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98), 頁 220-226; 陳以愛 Chen Yiai:《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Zhongguo xiandai xueshu yanjiu jigou de xingqi*, 頁 42-45; 羅志田 Luo Zhitian:〈文學的失語:整理國故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Wenxue de shiyu: zhengli guogu yu wenxue yanjiu de kaoju hua”,載羅志田 Luo Zhitian:《裂變中的傳承:20 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

朱自清當時發表的一些文章，可以見到他面對這個學術環境的感受。他在〈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1926年）一文批評主張國學的人說：

他們只抱殘守缺地依靠着若干傳統，……絕不在傳統以外去找事實。……〔他們以為〕一、國學以外無學；二、古史料外無國學。⁵⁵

在〈那裏走〉（1928年）中他會說：

現在年齡是加長了，又遇着這「動搖」的時代，我既不能參加革命或反革命，總得找一個依據，才可姑作安心地過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鑽了進去，消磨了這一生。我終於在國學裏找着一個題目，開始像小兒的學步。……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⁵⁶

朱自清的徬徨心情，時局紛亂固然是主要的因素，但在清華學部的生活環境，也可能讓他心緒不得平靜，要在「國學」與「文學」之間尋得慰藉。他當時的判斷是：「文學」只能看作娛樂，因為當時的學界，仍然是以「國學」為重。我們知道他是新詩前驅、現代散文名家，但到了清華不久，因為任教的科目正是古文詩詞，要適應環境，開始鑽研「國學」，拜黃節為師，學寫舊詩，向俞平伯請教填詞。⁵⁷這個局面要到楊振聲的來臨，才有所改變。

Liebian zhong de chuancheng 20 shiji qianqi de Zhongguo wenhua yu xueshu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2003年), 頁255-321; 徐雁平 Xu Yanping: 《胡適與整理國故考論: 以中國文學研究史研究為中心》*Hu Shi yu zhengli guogu kaolun: yi Zhongguo wenxue yanjiushi yanjiu wei zhongxin* (合肥[Hefei]: 安徽教育出版社[Anhui jiaoyu chubanshe], 2003年), 頁54-109。

⁵⁵ 朱自清 Zhu Ziqing: 〈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Xiandai shenghuo de xueshu jiazhi”, 《文學週報》*Wenxue zhoubao* 224期(1926年5月), 頁439-442。這篇文章引起了曹聚仁、葉紹鈞、周予同等參與駁辯與討論, 參見劉東 Liu Dong、文韜 Wen Tao 編: 《審問與明辨》*Shenwen yu mingbian* (北京[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12年), 頁698-721。

⁵⁶ 朱自清 Zhu Ziqing: 〈那裏走〉“Nalizou”, 《一般》*Yi ban* 第4卷第3期(1928年3月); 載《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4卷, 頁226-244。我們注意到當時正值國民黨北伐之後, 撼動社會的思潮已由「文學革命」轉移為「革命文學」。當時的「國學熱」其中一個原因是借學術之名以遁世。

⁵⁷ 參考〈詩課〉“Shi ke”, 《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5卷, 頁138; 季鎮淮指出: 「此時前後, 先生專心於模擬唐五代詞及漢魏六朝古詩, ……其所以模擬者, 只是作為了解、研究中國舊詩詞的一種方法。而研究舊詩詞是先生的教書工作的一部分。先生擬古詩就

1928年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羅家倫為校長，任命楊振聲為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楊與朱自清為北大校友，初到清華，就約同朱自清一同規劃學術發展。⁵⁸1930年楊振聲離開清華大學到山東籌辦青島大學，系務由朱自清主持。⁵⁹楊、朱二人，可說帶動了「中國文學」學科觀念的新變。我們先看看楊振聲的說法：

現在講起辦大學，國文學系是要算最難了。第一是宗旨的不易定，第二是教員人選的困難。我們參考國內各大學的國文系，然後再來定我們的宗旨與課程，那自然是最邏輯的步調了。不過，難說得很，譬如，有的注重於考訂古籍，分別真贋，校核年月，搜求目錄，這是校讎目錄之學，非文學也。有的注重於文字的訓詁，方言的詮釋，音韻的轉變，文法的結構，這是語言文字之學，非文學也。有的注重於年譜傳狀之核博，文章體裁之軼演，派別門戶之分劃，文章風氣之流行，這是文學史，非文學也。以上這幾種，都可以包核在國文學系，但這不過是研究文學之方法，不是研究文學之宗旨。⁶⁰

楊振聲的思考是「中國文學系」應該是以「文學」為主的，但現不少中文系的教學與研究活動，如校讎目錄之學、語言文字之學、文學史等，都不是「文學」。

正於黃晦聞先生，在詞的方面與俞平伯先生相切磋。」見季鎮淮 Ji Zhenhuai：《朱自清先生年譜》*Zhu Ziqing xiansheng nianpu*（香港[Hong Kong]：匯文閣書店[Huiwenge shudian]，出版年缺），頁31；姜建 Jiang Jian、吳為公 Wu Weigong：《朱自清年譜》*Zhu Ziqing nianpu*（北京[Beijing]：光明日報出版社[Guangming ribao chubanshe]，2010年），頁66。黃節在1929年受聘於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成為朱自清的同事；參考齊家瑩《清華人文學科年譜》，頁89-90。

⁵⁸ 楊振聲回憶當年創辦中文系時說「系中一切計劃，朱先生與我商量規定者多。」見楊振聲 Yang Zhensheng：〈為追悼朱自清先生講到中國文學系〉“Wei zhuidao Zhu Ziqing xiansheng jiangdao Zhongguo wenxuexi”，《文學雜誌》*Wenxue zazhi* 3卷5期（1948年10月），頁35；又說：「我到清華時，他就在那受氣的國文系中作小媳婦！我去清華的第二天，便到古月堂去訪他。……就在這小屋裏，我們商定了國文的計劃。」見楊振聲 Yang Zhensheng：〈紀念朱自清先生〉“Jinian Zhu Ziqing xiansheng”，《新路》*Xin lu* 1卷16期（1948年8月），頁18。

⁵⁹ 參考姜建 Jiang Jian、吳為公 Wu Weigong：《朱自清年譜》*Zhu Ziqing nianpu*，頁76。

⁶⁰ 見〈清華中國文學會有史之第一頁〉“Qinghua Zhongguo wenxuehui youshi zhi diyiye”，《國立清華大學校刊》*Guoli Qinghua daxue xiaokan* 第22期，1928年12月17日。

朱自清接掌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以後，曾在《清華周刊》介紹本系課程，其觀察與楊振聲之說相同；他在1931年6月周刊上說：

中國各大學的國學系、國文學系，或中國文學系的課程，範圍往往很廣：除純文學外，更涉及哲學、史學、考古學等。他們要造成的是國學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國文學的人才。對於中國文學，他們要學生做的是舊文學研究考證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學的創造。我們並不看輕舊文學研學研究考證的工夫，但在這個時代，這個青黃不接的時代，覺得還有更大的使命：這就是創造我們的新文學。⁶¹

在1934年6月周刊上朱自清又說：

研究中國文學又可分為考據、鑒賞及批評等。從前做考據的人認為文學為詞章，不大願意過問；近來風氣變了，漸漸有了做文學考據的人。但在鑒賞與批評做工夫的還少。舊日文獻涉及這方面的大抵零碎瑣屑，不成片段；發揮光大，是現在人的責任。這等處自當借鏡於西方，只不要忘記自己本來面目。⁶²

從楊振聲和朱自清對當時中文系課程和研究的觀察，可以見到他們的現代學科理念，是透過釐清邊界，確立研究的主要對象。他們的觀念中有若干組「二元對立」：「文學訓練」和「非文學訓練」、「文學研究考證」和「文學的鑒賞與批評」、「舊文學的研究」和「新文學的創造」。繼之，要分清主從，有所取捨；具體來說，他們認為文學的「本體」活動，應是鑒賞和批評，以及「新文學的創造」。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依着這種理解，有關文學的「周邊」活動，如版本流變聚合的考訂與校讎、作品中的名物訓詁，甚至作品題材的流傳演變、作者的生平傳記等的研究，都具備可以「客觀實證」的知識體；反而文學的「本體」活動，離不開感發情志、知音共鳴等，看來比較主觀和難以衡量，如何可以安置在以創發和傳授「知識」的學術架構之內，而不致備受質疑或者蔑視？這就是連繫到楊、朱的文學學科理念在「分」之餘，還要「合」：除了要「合」於

⁶¹ 朱自清 Zhu Ziqing：〈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概況〉“Qinghua daxue Zhongguo wenxuexi gaikuang”，《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8卷，頁405。

⁶² 朱自清 Zhu Ziqing：〈中國文學系概況〉“Zhongguo wenxuexi gaikuang”，《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8卷，頁411。

中國以外，更要「合」於現代的中國，「合」於現代的世界。楊振聲在〈為追悼朱自清先生講到中國文學系〉（1948年）中說：

自新文學運動以來，在大學中新舊文學應該如何接流，中外文學應該如何交流，這都是必然會發生的問題，也必然要解決的問題。可是中國文學系一直在板着面孔，抵拒新潮。……朱自清先生是最早注意到這問題的一個。那是十七年秋季，清華已經正式成立大學，我擔任了中國文學系的主任。……系中一切計劃，朱先生與我商量規定者多。那時清華國文系與其他大學最不同的一點，是我們注重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學的融會。

楊振聲還引述 1929 年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課程的說明：

我們的課程的組織，一方面注意研究我們的舊文學，一方面更參考外國的現代文學。……外國現代文學經時間上的磨練，科學哲學的培養，圖畫，音樂，彫刻，建築等藝術的切磋，在內容及表現上都已是時代的產兒了。……對於人家表現藝術的——文學大部是表現藝術的——進步，結構技巧的精緻，批評藝術的理論，起碼也應當研究研究，與自己的東西比較一下。比較研究後，我們可以捨短取長，增益我們創造自己的文學的工具。⁶³

字裏行間顯示出「西方」即「現代」即「進步」的迷思；然而與傳統「接流」、與世界「交流」，以「現代中國」為立腳點，又的確是當時許多知識份子的共同願望。朱自清也是從這樣的思考方向，往西方探索。

朱自清早在進入清華學校教書之前，還是以新文學作家的身份參與「文學研究會」的時候，就嘗試了解西方的文學批評。1923年他在「文學研究會」的主辦的《文學》周報發表了他的譯作〈近代批評叢話〉第一篇〈心靈的漫遊〉（“The Adventures of the Soul”）；1925年再在同一副刊發表第二篇〈聖林〉（“The Sacred Groves”）；兩篇都是著名印象主義批評家佛朗士（Anatole France）的批評論，選自美國柳威生（Ludwig Lewisohn）的《近代批評輯要》（*A Modern Book of Criticism*, 1919年）。柳威生這個選本收錄了法國、德國、英國和美國 25 位近代批評家的論文。他的批評主張與新人文主義批評白璧德（Irving Babbitt）、

⁶³ 楊振聲 Yang Zhensheng：〈為追悼朱自清先生講到中國文學系〉“Wei zhuidao Zhu Ziqing xiansheng jiangdao Zhongguo wenxuexi”，頁 34-40。

摩爾（Paul Elmer More）或者現代主義批評家艾略特等不同，他反對固定的評價基準，主張開放心靈懷抱，自由地欣賞文學。因此這個選本以佛朗士的「靈魂歷險論」為開端是很有理由的。⁶⁴

朱自清選譯柳威生此書，大概反映了上世紀 30 年代以前國人對西方文學批評的認知的一端。由胡愈之等的介紹性著述《文學批評與批評家》（1924 年），以及由日本傳入的宮島新三郎著、高明譯《文藝批評史》（1930 年），⁶⁵或者口耳相傳的森次巴力《文學批評史》，所觸及的批評家雖然有古有今，但主要的論述觀點離不開十九世紀到世紀末。當然，影響中國文學界的英美論著，如森次巴力三卷《文學批評史》以及蓋利與史葛合編的《文學批評的方法與資料導論》，以至莫爾頓、亨德等的文學概論等，其作者群大體是世紀之交的文學風潮的承納者。再者，這個時期的文學論述空間，開始由報刊書評移到學院講壇去，於是造就了這批具備「學術」外觀的文學與文學批評的概論和歷史著作；⁶⁶大家不忘下定義、講原理，或者依歷時方向鋪陳排比，又或者設計圖表列項析述，以切合學院的「科學研究」環境。但正如前文所述，這時期只能算是「批

⁶⁴ 參考 Ludwig Lewisohn, "Introduction," *A Modern Book of Criticism* (New York: Boni & Liveright, 1919), pp.i-iv. 朱自清對人名和書名的翻譯先後有所不同，編者前作「柳威生」，後作「路惠生」；書名先作《近代批評輯要》，後作《近代批評叢選》；選篇作者先作「佛朗士」，後作「法蘭西」；分見《文學》周報 94 期（1923 年 10 月 29 日）、174 期（1925 年 5 月 24 日）；收入《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 8 卷，頁 498-502；503-504。柳威生此書後來有兩個中譯本：傅東華 Fu Donghua 譯：《近世文學批評》*Jinshi wenxue piping*（上海[Shanghai]：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guan]，1928 年）；李霽野 Li Jiye 譯：《近代文藝批評斷片》*Jindai wenyi piping duanpian*（上海[Shanghai]：未名社[Weimingshe]，1929 年）。耶魯批評家哈特曼在他的《荒野中的批評》一書的導論中，對柳威生和他的選本的在美國批評史的意義作出細緻的分析，見 Geoffrey Hartman,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Toda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10-14.

⁶⁵ 宮島新三郎 Miyajima shinzaburo 著，高明 Gao Ming 譯：《文藝批評史》*Wenyi pipingshi*（上海[Shanghai]：開明書店[Kaiming shudian]，1930 年）。這是 30 年代頗為流行的一本西方批評史的譯本。

⁶⁶ 有關當時文學批評進入學院的一般情況，可參考 M. A. R. Habib,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A History*, pp.10-13；以及 Chris Baldick, *The Social Mission of English Criticism 1848-193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Brian Doyle, *English and Englishness* (London: Routledge, 1989)；Peter Widdowson,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9)；Franklin Court, *Institutionalizing English Literature: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Literary Stud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Josephine M. Guy and Ian Small, *Politics and Value in English Studies: A Discipline in Cri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Carol Atherton, *Defining Literary Criticism: Scholarship, Authority and the Possession of Literary Knowledge, 1880-2002*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評的時代」前的預備階段；細審上列的文學理論或者批評史，就會發覺這些論述者對文學雖然充滿熱誠，但他們筆下的文學和批評的「理論」，其實仍然是報刊評論的風格(journalistic)，由常識和主觀信念立說，其學術性質(academic)並不太強。⁶⁷這些論說傳入中國以後，在學院雖然也通行一時，大家都把這些泛泛之論掛在口邊，⁶⁸但似乎對實質的文學研究，未能做成重要的影響；也不足以動搖傳統訓詁考證等「語文學」的治學方向。

朱自清顯然不滿足於此，他透過和任教西洋文學的同事翟孟生(R. D. Jameson)的交往，接觸更多的西方文學評論；1927年翟孟生推薦他和李健吾合譯英國布拉德雷(A. C. Bradley, 英國著名莎士比亞研究專家)的文章〈為詩而詩〉(“Poetry for Poetry's Sake”)。這是布拉德雷於1901年6月5日就任牛津大學詩學教授的就職演講詞(Inaugural Lecture)；這時他的經典著作《莎士比亞悲劇》(*Shakespearean Tragedy*, 1904年)還未出版。但這篇就任講詞內容非常豐富，除了顯示出布拉德雷的詩學理論及思想淵源之外，還關係到文學教育與當時社會意識種種爭議，是英國文學作為學科進入大學體系過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獻；其重要性已經有學者作出深入分析。⁶⁹朱自清未必知悉這篇演講詞背後的文化政治，但文中有關詩的「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與「外在價值」(ulterior value)的討論，「形式配置是一切」(the form, the treatment, is everything)等主張，應該會留下深刻印象。⁷⁰在全國學術界龐大的「語文學」

⁶⁷ 例如莫爾頓的《文學的現代研究》面世之時，就有評論指其書充斥着主觀的判斷，同樣的批評見於韋勒克對森次巴力的批評；見J. Robertson, “Review of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12.1 (1917.1): 120-123;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416-428。森次巴力的批評理念見“Introductory Essay,” in George Saintsbury, *Essay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780-1860*, pp.ix-xxix。

⁶⁸ 例如當時相對保守，反對新文化的錢基博撰寫《現代文學史》(1934年)，在〈緒論〉一章也有講「狹義的文學」、「廣義的文學」、「美的文學」；又說「文學史者，科學也。」等定義。見《現代中國文學史》*Xiandai Zhongguo wenxueshi*(長沙[Changsha]: 嶽麓書社[Yuelu shushe], 1986年)，頁1-9。

⁶⁹ 參考Chris Baldick,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heory 1890 to the Present* (London: Longman, 1996), pp.31-32; Josephine M. Guy and Ian Small, *Politics and Value in English Studies*, pp.161-164; Anthony Kearney, “Confusing the Issue? A. C. Bradley's Theory of Poetry and its Contexts,” *Victorian Poetry* 41.2 (2003.6): 245-257。有關英國文學立科的情況，參考陳國球K. K. Chan:《文學如何成為知識?》*Wenxue ruhe chengwei zhishi?* (北京[Beijing]: 三聯書店[Sanlian shudian], 2013年)，頁2-4、18-19。

⁷⁰ 朱自清 Zhu Ziqing、李健吾 Li Jianwu 譯:〈為詩而詩〉“Wei shi er shi”，原載《一般》*Yi ban*

勢力籠罩下，布拉德雷這種「文學」有值得追求的「內在價值」的想法，有如一扇透氣的窗，可以讓朱自清以「國學」為職業的沉悶生活中呼吸到新鮮的空氣。當然，布拉德雷這篇演講詞還未有太多的文學分析展示出來；朱自清所得大概是詩學理念的吸收，這與他在同年翻譯翟孟生的《純粹的詩》（“Pure Poetry”）的收獲應大致相同。⁷¹

1928年秋季以後，朱自清得到系主任楊振聲的支持，並合力制定新課程，學術空間有所拓展，年度下學期甚至可以開設「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翌年又開設新課「歌謠」。當然，學風不會一時逆轉；朱自清要為他所理解的「文學」取得與經籍訓詁之學同等地位，還要花更多的心力。從現在能看到的朱自清日記中，可知1931年他已注意到劍橋學派瑞恰慈（I. A. Richards）和他的學生燕卜遜（William Empson）的語意學和文學批評論述。⁷²當時他正休假到英國訪學，乘時遊歷歐洲各國，眼界更為開闊。回國後刻意向西方批評取經，卻也未嘗鬆懈古典的研習。例如1932年9月29日日記說：「擬研究興詩，並讀西人評詩之文。」同年10月19日日記說：「定習日文、英文，讀詩論及批評書。又研究興詩及讀香山、放翁集、新文學書亦須讀。以後須能教詩聲律史，宋人討論歌謠、杜詩、陸詩、白詩等。」10月25日日記說：「每日讀《詩經》、誦詩、詞、曲、新詩。」又常常與中文系浦江清、聞一多，西文系葉公超等討論中外文學問題。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和著述既有依傍傳統國學方法之處，同時開展了結合中西批評方法的新路。以下我們嘗試把朱自清1932年8月回國

3卷3期（1927年11月），收入《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第5卷，頁505-516；這譯文並不完整，全文尚有三分之二未有譯出；見A. C. Bradley, *Poetry For Poetry's Sake: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on June 5, 190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1)。

⁷¹ 佩弦 Peixian（朱自清 Zhu Ziqing）譯：〈純粹的詩〉“Chuncui de shi”，《小說月報》Xiaoshuoyuebao 18卷12期（1931年12月），頁2-10。

⁷² 有關朱自清受瑞恰慈和他的學生燕卜遜影響，學界已有不少研究；甚至從朱自清日記整理出他研讀瑞恰慈和燕卜遜著作的資料；參考孫玉石 Sun Yushi：〈朱自清現代解詩學思想的理論資源〉“Zhu Ziqing xiandai jieshi xue sixiang de lilun ziyuan”，《中國現代解詩學的理論與實踐》Zhongguo xiandai jieshi xue de lilun yu shijian（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7年）第4章，頁65-95；李先國 Li Xianguo：〈借鑒之三：朱自清與瑞恰慈和燕卜遜的語義分析學說（1929-1948）〉“Jiejian zhi san: Zhu Ziqing yu Ruiqiaci han Yanbusun de yuyi fenxi xueshuo”（1929-1948），《化俗從雅文學觀的建立：朱自清與西方文藝思想關係研究》Huasu congya wenxueguan de jianli: Zhu Ziqing yu xifangwenyi sixiang guanxi yanjiu（北京[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07年）第4章，頁124-170。

後，由 1933 年到抗日戰爭爆發的 1937 年之間所發表的重要古典文學著述排列，就比較容易看到朱自清的努力方向：

1933 年：〈與黃晦聞先生論清商曲書〉、〈中國文評流別述略〉

1934 年：〈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論「逼真」與「如畫」〉、〈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

1935 年：〈詩多義舉例〉、〈李賀年譜〉

1936 年：〈李賀年譜補記〉、〈再論「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王安石《明妃曲》〉

1937 年：〈詩言志說〉、〈賦比興說〉、〈修辭學的比興觀——評黎錦熙《修辭學比興篇》〉、〈《文選序》「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說〉

這幾篇文章大致可分成三類：一是屬於傳統「國學」方式文史考證，如：〈與黃晦聞先生論清商曲書〉、〈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李賀年譜〉、〈李賀年譜補記〉；二是嘗試用新掌握的批評方法解讀作品，如：〈詩多義舉例〉、〈再論「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王安石《明妃曲》〉；第三類是以現代觀念照見中國文學批評傳統，如〈中國文評流別述略〉、〈論「逼真」與「如畫」〉、〈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詩言志說〉、〈賦比興說〉、〈修辭學的比興觀——評黎錦熙《修辭學比興篇》〉、〈《文選序》「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說〉。

第一類研究方式講實證，從文獻考訂見工夫，是中文系傳統最贏得尊重的「硬科學」，向來受到尊重；這好比英美教育史上「英文研究」進入英美大學體系時，「語文學」同樣因為具此優越的條件而得佔先機。朱自清既然「以國學為職業」，他有必要在這個領域表現出一定的實力。其中他與黃節論樂府一文最有意思。黃節是他學詩的前輩；他很客氣地寫信與之商榷，是希望向這些舊學先生顯示自己具備加入這個「國學圈子」、參與他們的活動的資格。然而黃節卻回答說：

徒為題目源流，紛爭辯論；而於樂府本體，不求探索；開篇不能明其義，則秉筆不能續其詞；只有批評，而無感興撰作，又無益之甚矣，非僕倡言樂府之本意也。⁷³

⁷³ 有關討論的三封信以〈樂府清商三調討論〉“Yuefu qingshang santiao taolun”為題，刊於《清華學報》*Qinghua xuebao* 39 卷 8 期，頁 821-828。黃節回信題為〈答朱佩弦先生論清商曲〉“Da Zhu Peixian xiansheng lun qingshangqu”，引文見頁 828。

這顯示出所謂「舊學」中人，其實也可以有不同取向；當朱自清以認真的態度去從事考證時，黃節則以儒家「義理」和「以詩明志」比「考證」優先作回應。這一點令朱自清相當不服氣，⁷⁴但他要與傳統「接流」的態度並沒有改變。

第二類屬於「鑒賞與批評」，是他和楊振聲在構思中國文學研究的主幹部分。然而「鑒賞與批評」一直被傳統學者所輕視，以為不必教，也無以學。因此，朱自清試圖以「分析」作為這個領域的學理元素。因為「分析」是要學習才能掌握，有「知識」的成份。〈詩多義舉例〉開篇說：

了解詩不是件容易事，俞平伯先生在〈詩的神秘〉一文中說得很透徹的。他所舉的「聲音訓詁」、「大義微言」、「名物典章」，果然都是難關。……這些難關，全由於我們知識不足；大家努力的結果，知識在漸漸增多，難關也可漸漸減少。……所謂努力，只是多讀書，多思想。就一首首的詩說，我們得多吟誦，細分析；有人想，一分析，詩便沒有了，其實不然。單說一首「好」是不夠的，人家要問怎麼個好法，便非先做分析的工夫不成。……還只有憑自己知識力量，從分析下手。⁷⁵

此外，他在同一年開始構思，但遲至 1941 年才刊出的《古詩十九首釋》，也有可供參照的講法：

詩是精粹的語言。因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許多人覺得詩難懂，便是為此。但詩究竟是「語言」，並沒有真的神秘；語言，包括說的和寫的，是可以分析的；詩也是可以分析的。只有分析，才可以得到透徹的了解；……有時分析起來還是不懂，那是分析得還不夠細密，或者知識不夠，材料不足；並不是分析這個方法不成。……只有能分析的人，才能切實欣賞；欣賞是在透徹的了解裏。一般的意見將欣賞和了解分成

⁷⁴ 朱自清在 1933 年 5 月 10 日日記提到黃節表示不再回答自己的進一步問題，心裏的想法是：「以黃先生之高年而盛氣凌人如此，亦殊可笑也。」見《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 9 卷，頁 218-219。張耀宗曾對黃、朱二人的討論有非常細緻討論，他認為朱自清不可能如黃節般浸潤於考證、批評和創作三位一體的世界，只能以新的方式尋求考證與批評的關聯；見張耀宗 Zhang Yaozong：〈重建古文學的閱讀傳統——從朱自清與黃節的一次討論談起〉“Chongjian guwenxue de yuedu chuantong: cong Zhu Ziqing yu Huang Jie de yi ci taolun tanqi”，《清華大學學報》*Qinghua daxue xuebao* 2011 年 6 期，頁 106-115。

⁷⁵ 《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 8 卷，頁 206-207。

兩極，實在是不妥的。……一般人以為詩只能綜合的欣賞，一分析詩就沒有了。其實詩是最錯綜的，最多義的，非細密的分析工夫，不能捉住它的意旨。⁷⁶

我們只要把這兩段話和朱自清在出國前發表的〈論學詩門徑〉(1931年)比較，就看到其間的差異：

詩是精粹的語言，有它獨具的表現與法式。初學覺得詩難懂，大半便因為這些法式太生疏之故。學習這些法式最有效的方法是綜合，多少應該像小兒學語一般；背誦便是這種綜合的方法。⁷⁷

在「背誦」之餘，朱自清提供的「門徑」是參考《詩法易簡錄》、《詩式》一類詩法入門，多讀注本、評本、選本，再以詩話、詩史補其不足。這些建議實在談不上現代學術的方法學，與後來講求「語言分析」的批評新方向不可同日而語。再回看〈詩多義舉例〉和〈古詩十九首釋〉的說法，可以見到其中「知識」和「分析」都是關鍵詞。其中要旨是：一、讀詩與「知識」密切相關；二、詩的欣賞與了解，非經細密的「分析」不可。⁷⁸朱自清把「聲音訓詁」和「微言大義」都看成「知識」，前者屬「語文學」範圍，一向都具備「知識」的規模；但後者，據朱自清理解，是屬於「感情」的部分，是詩之所以為「文學」的關鍵，⁷⁹同視之為「知識」，再加上與其密切關連的「分析工夫」，則文學的欣賞與了解，再不是「模糊影響」，而是有方法、有準則的「知識體」。我們也看到朱自清之致力處，有很大程度是受瑞恰慈和燕卜遜等的批評理論的影響；〈詩多義舉例〉一文就特別提到：「去年暑假，讀英國 Empson 的《多義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覺着他的分析法很好，可以試用於中國舊詩。」⁸⁰

⁷⁶ 《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7卷，頁191。

⁷⁷ 《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2卷，頁83-88。

⁷⁸ 類似的說法又見於〈新詩雜誌·序〉“Xinshi zahua: xu”(1944年)：「作者相信文藝的欣賞和了解是分不開的，了解幾分，也就欣賞幾分；而了解得從分析意義下手。意義是複雜的。……詩是最經濟的語言，「曉得文義」有時也不易，「識得意思好處」再要難些。分析一首詩的意義，得一層層挨着剝起去，一個不留心便逗不攏來，甚至於驢頭不對馬嘴。」見《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2卷，頁316。

⁷⁹ 朱自清在〈詩多義舉例〉說：「語言作用有思想的、感情的兩方面，……所謂『聲音訓詁』，屬於前者。……所謂『大義微言』，屬於後者。詩這一種特殊的語言，感情的作用多過思想的作用。」見《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8卷，頁207。

⁸⁰ 見《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8卷，頁208。

英國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劍橋學派——瑞恰慈、燕卜遜，利維斯 (F. R. Leavis) 等——將文學分析打造成有嚴謹學理和方法的「文學批評」，這種模式的「批評」和 19 世紀末森次巴力等仍然不脫報刊書評形式的「批評」大有不同。就以瑞恰慈來說，他從 1917 年開始在劍橋任教，所著《文學批評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24 年)、《科學與詩》(*Science and Poetry*, 1926 年)、《實際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 1929 年) 等，為文學帶來正規的學科元素，閱讀不再是隨意賞析的消閒活動，而是有方法、有系統的知識存乎其中；當中的「細讀」(close reading) 訓練讓「文學」的評斷超越個人主觀品味的展示，「文學批評」從此成為一種學術活動。另一方面，根據伊格爾頓 (Terry Eagleton) 等的讀法，瑞恰慈之重視文本並不等於一種不顧外在世界的「形式主義」；「文本」對雜亂的心理衝動加以組織與調節，以成就一個均衡的整體，其實也是文學的社會功能的一種表現，可以撫平現世的種種不安；不單如此，瑞恰慈也視「批評」活動要整合各種思慮能力，故也可以舒緩批評者的內心張力，所以是一種堅毅的鍛鍊。⁸¹由瑞恰慈開其端的劍橋學派的「文學批評」，其知識的形態比較清晰，可以抗衡大學中穩固的「語文學」勢力，甚或取而代之；後來美國的「新批評」學派如布魯克斯 (Cleanth Brooks)、藍遜 (J. C. Ransom)、泰特 (Allen Tate) 等，雖然不願意接受瑞恰慈批評論中的心理學模型，卻繼承了他主要的方法學，重視文本的審察，講求系統分析；「細讀」亦由是被視為「新批評」的標記。美國「新批評」學派之能成功攻佔大學講壇，其推動具嚴謹方法學的「文學批評」絕對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故可以說，從瑞恰慈、燕卜遜等開始，英美學界正式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批評的時代」；⁸²而朱自清所受沾溉的，正是這種具備「知識」含量，可與「語文學」在學院爭勝的「文學批評」。

有學者指出大多數現代詩論，是只針對現代詩發言，而「新批評」中人卻罕見地企圖將其讀法廣泛應用推行到古今各類詩作上，目的為證明其分析法放

⁸¹ 參考 I. A. Richards,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47, 62, 153, 160; *Poetries and Sciences* (New York: Norton and Co., 1972), pp.82-83; *Practical Criticism* (London: Harcourt Brace & Co., 1929), pp.328-329; John Paul Russo, "I. A. Richards in Retrospect," *Critical Inquiry* 8 (1982): 743-760;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43-47; Chris Baldick, *The Social Mission of English Criticism*, pp.136-156.

⁸² 參考 William E. Cain, *The Crisis in Criticism: Theory, Literature, and Reform in English Studie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85-121; Murray Krieger, *The Institution of Theor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23.

諸古今而皆準。⁸³這個講法沒有錯，但漏去了最關鍵的一點：當時英倫學院內盡以古典為尚，幾乎所有人文學科的講座教授就職演講，還是以拉丁文發言；這些劍橋新銳想以其「文學批評」攻佔大學講壇，當然要證明其方法能處理「古典」的問題。同一道理，朱自清借助西方文學批評的方法如果只能解說新詩（他對現代詩的解讀主要見於《新詩雜話》，1947年），就很難在學院同儕或甚至學生群中得青眼。於是我們見到朱自清一直試驗以新法分析古典詩，〈詩多義舉例〉固然是方法論的示範，〈王安石《明妃曲》〉文末也特別聲明：「只在說明讀詩解詩的方法，藉着這兩首詩作個例子吧了。」⁸⁴當然最為集中的展現「分析」的具體方法的，是〈古詩十九首釋〉，以及同在1941年正式發表的〈《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古詩十九首釋〉在分析前有這樣的交代：

詩是精粹的語言，暗示是它的生命。暗示得從比喻和組織上作工夫，利用讀者聯想的力量。組織得簡約緊湊；似乎斷了，實在連着。比喻或用古事成辭，或用眼前景物；典故其實是比喻的一類。這首詩那首詩可以不用典故，但是整個兒的詩是離不開典故的。……要透徹的了解詩，在許多時候，非先弄明白詩裏的典故不可。⁸⁵

這個基本綱領的實踐，在兩篇文章的詩例分析可以見到。⁸⁶

朱自清在實踐他的「文學批評」時，往往會就傳統的評論作出反應。例如〈《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對於評論七絕的「風調」一詞作出解釋：「風搖而

⁸³ 趙毅衡指出燕卜蘇在《多義七式》所論「幾乎全是古典詩人，尤以文藝復興時代為多」；見趙毅衡 Zhao Yiheng：《重訪新批評》*Zhongfang xinpiping*（天津[Tianjin]：百花文藝出版社[Baihua wenyi chubanshe]，2009年），頁145；成瑋據此指出朱自清以兼包新、舊兩體自期，故惟有「新批評」的方法可以借用，見成瑋 Cheng Wei：〈「詩義」分析的越位之思——朱自清「解詩」法的理論背景與實踐指向〉“‘Shiyi’ fenxi de yuewei zhi si: Zhu Ziqing ‘jieshi’ fa de lilun beiing yu shijian zhixiang”，《浙江學刊》*Zhejiang xuekan* 2013年第4期，頁90。

⁸⁴ 見《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8卷，頁271。

⁸⁵ 《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7卷，頁192-193。

⁸⁶ 成瑋對朱自清的解詩，有非常深入的分析。可是他認為朱自清「每有重局部而輕整體的跡象」，以為是受到「燕卜蘇讀詩缺乏貫穿全篇的總體性視域」的影響。見成瑋〈「詩義」分析的越位之思〉，頁91。這個觀察並不準確。朱自清對「斷章取義」的解釋常有批評，而且據他對「典故」和「比喻」作出演繹，以為都可以「滲透全詩」，這個思考方向已可以反映他對詩之整體的重視；他的「典故」論給合「多義」說，其實已有現今所謂「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的味道，並不會把意義的詮釋限於局部。

有遠情，調悠揚而有遠韻，總之是餘味深長」，再從詩體裁和語言結構補充分析。⁸⁷又如〈再論「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一文提到沈德潛的評語「遠神不盡」，他就據分析所得的詩意指出「遠神」有兩個意思：「一是曲終而餘音不絕，一是詞氣不竭，就是說不盡」。⁸⁸這一種結合現代與傳統「批評」理念的方式，就已跨入上列第三類文章的方向：理解古人的批評觀念，認識中國的文學批評傳統。例如 1934 年發表的〈論「逼真」與「如畫」〉，就是以古典的文獻為據，對傳統的「批評」觀念作出現代的闡釋；其意可以由 1948 年修訂本的副題——「關於傳統對於自然和藝術的態度的一個考察」——可以見到。⁸⁹又朱自清另一篇論文〈「好」與「妙」〉（1948 年）也有類似的意義。這種思維，同樣適用於最受重視的〈詩言志說〉（1937 年）、〈賦比興說〉（1937 年）、〈詩教說〉（1943 年），再加「正變」合成的《詩言志辨》（1947 年）。我們再看朱自清更早發表的〈中國文評流別略〉（1933 年），當中分別討論「比興」、「教化」、「興趣」、「體性」、「字句」等傳統批評觀念，⁹⁰以至身後由學生劉晶雯整理出版的《朱自清中國文學批評研究講義》，亦專以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重要觀念為論。⁹¹可以見到朱自清意圖貫通古今（「中國的／傳統的」與「西方的」／「現代的」）的批評觀念，是一以貫之的。

朱自清一方面引進現代的（西方的）批評方法，以分析中國傳統和現代的文學，另一方面，過程中他又發覺有必要以現代的眼光，理解古人的批評觀念，認識中國的文學批評傳統；而理解和認識的方式，他在《詩言志辨·序》有這樣的描述：

更願意有許多人分頭來搜集材料，尋出各個批評的意念如何發生，如何演變——尋出它們的史跡。這個得認真的仔細的考辨，一個字不放鬆，像漢學家考辨經史子書。這是從小處下手。希望

⁸⁷ 《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 2 卷，頁 238。

⁸⁸ 《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 8 卷，頁 264。

⁸⁹ 〈論「逼真」與「如畫」〉“Lun ‘bizhen’ yu ‘ruhua’”，原載《文學》Wenxue 第 2 卷第 6 期（1934 年）；修訂本載天津《國民日報·文藝》Guomin ribao: wenyi 118 期（1948 年 3 月 8 日），收入《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 3 卷，頁 233-243。

⁹⁰ 《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 8 卷，頁 147-153。

⁹¹ 劉晶雯 Liu Jingwen 整理：《朱自清中國文學批評研究講義》Zhu Ziqing Zhongguo wenxue piping yanjiu jiangyi（天津[Tianjin]：天津古籍出版社[Tianjin guji chubanshe]，2004 年）。

努力的結果可以闡明批評的價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見，並堅強它那新獲得的地位。⁹²

朱自清的「現代」立場是很清晰的：「闡明批評的價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見，並堅強它那新獲得的地位」；但方法上，他卻要借助「考辨經史子書」的傳統考據之學。其指向當然包括這些「語文學家」治學的嚴謹態度，而重點更在研究的操作方式：要梳理古代文獻，考據校讎、訓詁小學仍然是有效的手段。於是，本意以「批評」作為知識體抗衡「語文學」獨大的學術風氣，到後來終於還是不能輕鬆擺脫「語文學」的影響。從這樣的歷史過程看來，「批評」之學，或有必要得着「語文學」的扶持。這也是後來中國文學批評史獨立成科，以至更名「中國文論史」之後的發展傾向。

四、結語：

以上我們考察了「文學批評」作為一個現代的學術概念的淵源和流變，以及這個概念在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發展過程中所佔的位置和作用。我們又以朱自清的學術角色作為具體觀察對象，從他參與的學科課程規劃、個人研究取向和理念實踐的過程，揭示現代的「文學批評」觀念與傳統的「國學」研究模式的對峙局面；同在朱自清身上，我們見到「文學批評」的理念和方法若要在本土實踐，就有必要與傳統「接流」，亦因此不能迴避傳統的「語文學」，而有需要得到其支援。當然，就以朱自清個人的研究歷程為證，他所開發的「中國文學批評」研究，與純粹的「語文學」相較，無論學術目標、研究效果，以至終極關懷，二者還是與有相當大的差異。⁹³其差異正在於朱自清之以「文學」為本位。這一份「文學」的關懷，使得「文學」不僅是文獻材料，而是古今中外人類文化心靈互通的觸媒。朱自清在〈中國文學系概況〉（1934年）提醒學生「自當借鏡於西方，只不要忘記自己本來面目」，就是承認中國與西方，實有其互通的可能，才有「借鏡」的必要；然而，既是「借鏡」於人，鏡前人已非

⁹² 《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6卷，頁129。

⁹³ 1948年8月朱自清致函繆鉞說：「稍暇擬草考證與批評一文，介紹美國近年歷史的、批評的方法，說明治學不當以冷靜瑣屑之考證自限。」見《朱自清全集》*Zhu Ziqing quanji* 第11卷，頁186；又參考繆鉞 Mou Yue：〈考證、批評與創作——敬悼朱佩弦先生〉“Kaozheng, piping yu chuanguo: jingdao Zhu Peixian xiansheng”，《冰蠶庵序跋隨筆》*Bingcanan xuba suibi*（石家莊[Shijiazhuang]：河北教育出版社[Hebei jiaoyu chubanshe]，2004年），頁107-109。

同一，得此「鏡」又可知「自己本來面目」。對於這當中的同中有異，如何因同見異，因異思通，是未來有志於「文學批評」研究者，所必須予以認真而深刻思考的。

【責任編校：李宛芝、蔡佩陵】

